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3)

1977-1980

中国经济理论 问题的讨论

代 成

人 民 出 版 社

F120

38

·13

1977-1980

中国经济理论
问题的讨论

代 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7—1980)

(13)

中国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

代 成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5印张 42,000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号 4001·455 定价 0.18元

目 录

一、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	4
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12
三、关于按劳分配原则	17
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30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39
六、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49
后 记	64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即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7—1980)》(共分十三册)所要介绍的是1977年至1980年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四年。四年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在前面十二个分册，即：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工业与交通；中国的商业；中国的金融；中国的财政；中国的人口；中国城镇的就业和工资；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些分册的内容，概括起来说，讲的都是这四年我国经济工作方面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些进步和发展同这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对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是分不开的。这些研究和讨论，一方面反映了这四年我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又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状况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理论和实际相互作用的原理。在

这个分册中，我们打算简单地介绍一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四年中，我国经济学界是在怎样的形势下进行讨论的；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有哪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哪些影响，对现代化建设起了哪些积极作用。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场讨论的历史渊源，我们就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介绍起。

这个理论是从1957年开始逐步发展形成的。在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本来，我们国家工作的重点就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但是实际生活却是另一种情况，即从那时起，却强调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继续革命。在1958年发生了急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错误指导思想和行为（它曾经得到“共产风”这个名称）。以后这种思想和行为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却一直占据上风，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进一步把它推到了极端，以后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是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并且认为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错误理论当然不能不反映到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来，表现在理论上主要就是反对强调发展生产力，认为那样做就会冲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可以冲击一

切，而不容许强调其他工作；反对贯彻按劳分配，认为贯彻按劳分配就不是政治挂帅，同时还认为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一个阶级与一个阶级之间斗争的根源。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他们的理论家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运用他们把持的宣传工具，大肆鼓吹这些观点，产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经济学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经济理论上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

我国经济学界对“四人帮”攻击“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是一系列理论斗争中的第一个“战役”。

“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在中国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产力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即1966年底，林彪、江青以及当时窃据中国共产党内重要职位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生捏造出来的。大家知道，列宁在1923年写过一篇题为《论我国革命》的短文。在这篇论文中，列宁批评第二国际的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根据“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认为俄国不应该进行十月革命。列宁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根本不顾“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这种革命形势使得俄国人民有进行革命的可能与必要，使得俄国历史发展在“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可以先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列宁并不否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不否认“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是他认为既然特殊的革命形

势,使得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俄国就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因此,列宁和第二国际的争论,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要不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前提,他反对的是“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是他们把“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怯弱”。①

第二国际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后来斯大林把它称之为“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或“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②这个概括是否确切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并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杜撰出来的“唯生产力论”这个提法,而且从斯大林用的是“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这个提法本身,就可以看出,他否定的并不是“生产力论”,而是它的庸俗化。康生等“批判唯生产力论”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提出上层建筑,首先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谬论。而且他们还把这个理论具体化,贯穿到现实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不要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能够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人民可以没有文化、革命和人民物质利益互相排斥、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贫穷、越穷越革命、富了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言论。由于这些极为荒谬的言

① 以上引文均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1页。

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2页。

论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气氛下，由这些掌握政治大权的人提出的，充斥于他们垄断的所有舆论工具，而且“批判唯生产力论”又被他们塞进了党的九大和十大报告里，因此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他们强行推销这种理论的结果，造成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重申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为了使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上来，首先就要扫清多年来“四人帮”宣传所造成的重大思想障碍，使人民搞清楚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全力以赴地推进建设事业的发展，到底对不对？“四人帮”宣传，把发展生产作为主要任务是不对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必须把阶级斗争放在首要地位。这种十分荒谬的观点，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仍旧发生着影响。虽然许多干部和群众已经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还是遇到严重的阻碍。这一方面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继续提“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口号，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就成为一件重要的工作。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一个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难道会成为一个需要经济学界郑重其事地进行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吗？这好象是一个笑话。其实这并不是笑话，而是我们中国一段时间内的

现实。

这场理论斗争的意义，不在于它有什么学术价值，而在于：第一、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第二、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而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所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实际上已经根本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虽然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它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不过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正是从我国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了分析。指出：“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①很清楚，八大决议里的这些提法基本上是对的，是符合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八大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内另一种思想逐渐抬头和发展。这种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他们一直企图复辟。并认为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按照这样的观点，八大所确定的路线就是不正确的。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斗争，八大所确定的路线终于被搁置起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作法。为了使这套作法得到理论的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9—810页。

革命”这套理论观点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八大关于经济建设是当前主要任务的思想,就被说成是什么“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这种荒谬的说法,从上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来看,就成为合理的东西了。这些说法本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既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寻找“理论”根据。于是他们就把列宁所批判的、后来斯大林称为“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搬了出来,使用“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扣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上。如前所述,列宁所批判的,只是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和俄国的苏汉诺夫等人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作为口实,来反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我国,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并没有任何人认为中国不该夺取政权,不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只是主张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应该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列宁所批判的第二国际的那种指导思想问题。林彪、康生、“四人帮”硬把考茨基等人以俄国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为口实来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活动扯在一起。经过他们这样精心的篡改和编造,就炮制出“唯生产力论”这样一个假想敌人,而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成了一根大棒。用这个大棒打击刘少奇同志,打击对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各级干部,甚至打击从事实践活动的工农群众。由于“批判唯生产力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理论战线上首先发动这场反

批判，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解除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经济学界批判“四人帮”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国经济学家们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演讲、文章和著作。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因素，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第一性的，如果按照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称之为“唯物论”，那末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也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这样，“唯生产力论”就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它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对它的“批判”是根本错误的。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林子力、有林写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本书写于1977年初，在1978年3月正式出版。在正式出版之前，它的初稿，由于斗争的需要，曾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印行，发行数量近5万册。初稿的部分内容，还在1977年11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后又根据听众的要求，于1978年2月至3月重播。还有部分内容，曾分别发表在《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上。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他们写的《“四人帮”批判“唯生产为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文章。这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原理，对“四人帮”和它的舆论工具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上各种论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通过经济学界对“四人帮”攻击“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使人们在思想上搞清了“四人帮”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基本

内容。认识到他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攻击历史唯物论，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场斗争中，不仅恢复了被“四人帮”阉割和歪曲的历史唯物论的本来面目，指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生产力作为唯一决定作用的东西并不含有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意思，坚持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和对这个原理的庸俗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搞生产、搞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实践活动，等等；而且消除了我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或“修正主义的”、“反动的东西”这类的惧怕心理，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得当时被破坏了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他们看到，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有利于我国人民的。有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是不会复辟的，因此他们热烈拥护党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们看到，~~比~~我国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在~~在社会生产~~力~~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实现这个战略转移，今后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因此他们决心使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使我国国民经济稳步地向前发展。

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在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之后，紧接着对“四人帮”颠倒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批判。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进行的第二个“战役”。这个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同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思想体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被“四人帮”搞得最混乱不堪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抛出来的谬论是很多的。主要的就是：他们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倒立”哲学，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得出政治决定经济、政治脱离经济、政治不为经济服务的一系列荒谬结论。具体说来有以下各点：第一，政治决定经济。张春桥说，政治权力决定所有制，姚文元说，路线决定所有制，梁效把张、姚的观点加以概括，更直截了当地说：“政治决定经济、业务与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①第二，政治不能为经济服务，也不能用经济状况来衡量政治工作的成果。程越在《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②中，把政治说成是不能为经济服务

①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76年2月12日《北京日报》。

② 《红旗》1976年第4期。

的“高贵”的东西，不仅政治不能为经济服务，连思想理论都不能为经济服务。翟青在《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①中公然否定列宁下面这个著名的论断：“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②说什么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是在“特定环境下”才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而在一般环境下，则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来衡量，即政治工作的成果用政治来衡量。第三，政治和经济分裂。吕达在《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中攻击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③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们散布所谓“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没有关系”，^④搞革命可以“停产、停工”，可以“颗粒无收”等等，就是他们割裂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典型语言。不仅如此，吕达在上面引用的同一篇文章里还给既注重政治又努力发展生产扣上“反动”的帽子。“四人帮”在分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还采取另一个手法，即把政治和经济直接等同起来，用政治吞并了经济，散布“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⑤“一锹一镐不用动，路线解决了，生产就上去了”，^⑥等等。这就是“四人帮”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

① 《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4期。

②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60页。

③ 1976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④ 1976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⑤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⑥ 1976年11月29日《辽宁日报》。